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五五期 ——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4 a)

-
- 【史海钩沉】“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王年一
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唐少杰
【专题研究】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唐少杰
【文献资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 王年一 •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

◇ 复杂的上层背景

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编注）的、海军中保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编注）的、总后中保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长——编注）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

“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编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编注）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也就未引起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很残酷的。于是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对这一大派，既恨之人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革命”、“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许多领导人是不同意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会后就在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1966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1966年夏秋之交就开始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护毛泽东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题上，在支持还是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当了然于胸的。

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毕竟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在若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左派”，又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根本原因是谁也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右派”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1967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对过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阶级司令

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

◇ 事件的简要经过

1967年4月20日（或22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肖华、杨成武在场，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人也在场。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他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于是总政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战友文工团在5月1日按照这一指示，联合组织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叶群告诉他：“徐秘书（即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来，传‘一纽’（即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这显然是要叶群支持她们。亦即支持少数派。于是，叶群接见了刘素媛等几个女演员。叶群问：“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小刘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又说：“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叶群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这是指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不同于周恩来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老三军”，他们的活动是空军、海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支持的。他们计划5月13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他们的对立面，即后来被称为“新三军”的一些群众组织，当即指责“老三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扬言要去冲击“老三军”的演出。

1967年5月9日，战友文工团的三个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反映另一派要冲他们5月13日的演出，要求支持。谢当时严肃地说：你们要按照总理关于联合起来的指示组织演出，否则，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都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你们的演出，我可以了解一下。

当天，谢了解到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立即报告了肖华和徐立清。肖、徐指示：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军委文革办公室随即转告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办公室，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总理指示。

5月12日深夜，海军领导机关中支持李作鹏的“红联总”的几百人，冲进三座门军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了一些文件和谢镗忠与文艺口同志谈话的记录。这个“红联总”是“老三军”的“司令部”，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5月13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

5月13日下午，李作鹏在他家里召集了有海军“红联总”和海军各大部“红联总”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红联总”的顾问肖云和海政宣传部副部长范丕忠、干

部副部长刘光、海司办公室李凯都参加了，王宏坤、张秀川也在座。李作鹏首先说明肖华主任不同意一派演出，接着分析了形势。他说：如果我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至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了，对立面就会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到底演还是不演。由于这次演出早已作了准备，而且有恃无恐，所以“红联总”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还是要演。没有人提出不演。最后李作鹏作结论说，今晚演出不变，但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对立面来冲击，发生武斗，我们就上去支援，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份人在现场，一部份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如果演出没有人看，那就把“红联总”的人员拉去看。

当日晚饭后，根据下午会议的分工，范丕忠和海军“红联总”的一些头头去展览馆作了布置，李作鹏和“红联总”另一些头头在李家负责总的指挥。在李家的还有王宏坤、张秀川、肖云、刘光等。演出前，一方面由李作鹏的妻子、海司办公室副主任董其采与“林办”保持电话联系；一方面有人与范丕忠电话联系。不久，现场指挥人员来电话说，礼堂人已坐满，演出已准备好，并说肖华主任和陈伯达已经到了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董其采与肖华夫人王新蓝通电话，王说，肖华的意思，为防止发生问题，还是不演出为好。董又与叶群通话，叶群表示支持演出。不久，叶群又传来江青的电话，也表示支持演出。最后。叶群又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就在这时，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击演出，发生了武斗。李作鹏、肖云等随即乘车去现场。武斗双方都在调人增援，李、肖坐的汽车陷在对立面的队伍中好长时间。他们到现场后，见到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在那里。卫戍区部队也去了，但在一个屋子里没有出来。毕竟因为海军是有准备的，去的人多，不久就把冲击会场的一派（以后人们又称之为“冲派”）赶走了。双方共伤50多人。

当晚9时，李曼村在京西宾馆从军委文革办得知双方武斗，即遵照肖华的指示，要文革办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制止武斗。不料文革办张凤翠等三人赶到现场后，当即被海军文工团的一些人抓去两人，带到海军大院扣押起来，被审问了四天。

5月14日，李曼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军委文革办王承化到医院慰问双方受伤人员。接着向总理写了报告，汇报了“5·13”事件的经过和慰问的情况。同日，“老三军”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出；在海军直属机关群众大会上，被打伤的文工团员赵云卿进行了所谓“控诉”，点了肖华的名；林彪派叶群带领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人，到医院慰问“老三军”派受伤人员，还代表林彪赠送给他们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

接着林彪、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告肖华的状。叶群还对江青说，吴、李、邱对肖华意见很多，希望中央文革碰头会让他们三人谈一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文革开碰头会，让吴、李、邱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恩来没有出席，叶群也未到会。吴、李、邱在会上讲了对肖华的意见，江青表态支持批判肖华。随后，关锋、戚本禹等到北京军区礼堂接见了“老三军”派文体人员，代表中央文革表示支持和慰问。

按照叶群的布置，“老三军”派各文工团在京西宾馆批判肖华，批判了一个星期。

5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军部份文体工作者。海军人员由张秀川带队，“红联总”负责人谭安也去了。到会者要求批判肖华，周恩来未予同意。

当肖华讲话时，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董崇泉拍了桌子。周恩来为此很生气，问了董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但张根本没有把周总理的指示当回事。“老三军”仍然遵照林彪、叶群的意图，把“5·13”事件归咎于肖华，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恶浪。

6月9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等在人大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驻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肖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北京军内造反派的志气。

在“5·13”以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5月13日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 一条秘而不宣的方针

有人说：“1967年5月13日的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及其死党有预谋、有组织地搞乱军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人说：“这实质上是和周总理唱对台戏，向周总理示威，也是吴、叶、李、邱等人反对总政的罪恶活动。”有人说：“林彪、叶群利用‘5·13’事件作文章，如果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搞垮肖华，那就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叶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这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没有真正击中问题的症结。

事件发生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首都（连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梓也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红联总”的头头竟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群众大会，这更为历史所仅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更是飞黄腾达。这自然都与林彪、叶群有关，他们确实是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更深入一步地看，整个“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事件。

感谢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提供了前引的珍贵历史线索。如今，毛泽东已经仙逝，徐业夫也已辞世，叶群则已葬身荒漠，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1967年4月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癖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周恩来的指示是合乎毛泽东本来的意图的。直到1967年9月，“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规定群众组织只有实现了大联合，其领导人才能参加人大大会堂的国庆宴会。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5月。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不是缓和而是大为激化了。党内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越来越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全国各地两大派的矛盾和争斗普遍加剧。这些矛盾和争斗，从根本上说，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是号召全面夺权和划定“左派”与“非左派”的产物；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严重妨碍了“大联合夺权”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此关乎全局的情况绝不会

掉以轻心。军队的动向无疑是毛泽东更为关注的，他绝不会对大军区“支左”大都是所谓“支错了”无动于衷，他也会知道既然“支错了”就很难转轨。

毛泽东也许会因此忧虑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1967年4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军；通过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便之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利益。

这个方针，又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制止混乱的方针。既要坚持错误，彼时彼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此后纵横捭阖，以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过他们的“冲派”（即使没有参加冲击演出的“冲派”组织也毫无例外地被消灭），北京军内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几乎全部换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拥护他们的人。后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论“功”行“赏”。

事实说明，这个方针后来大体上得到了实现。虽然步履艰难，全军还是逐步走向了稳定，全国也逐步走向稳定，这才开成了“九大”。但是，既借重了与江青一伙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林彪一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酿成了后来的事变。

□ 于1998年9月24日

∞ ∞ ∞ ∞ ∞ ∞ ∞ ∞ ∞ ∞ ∞

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 唐少杰 •

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七·二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一个著名事件，它不仅给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折，而且对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文革历史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 清华两派百日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两派的论战伴随着小规模冲突，最主要的是，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由团派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了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

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 制止武斗在清华无法贯彻

1968年7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7·3”布告（即“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同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7月6日至25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7·3”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有利地位。团派总部向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一、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二、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北京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

相反，自6月下旬以来，势力相对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后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在整个武斗中的被动地位。

尽管至今还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决定向清华大学派遣旨在制止武斗的宣传队的详细内情，但是，据后来迟群多次讲，从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前后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7月26日17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动员部署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6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 宣传队冒死进驻清华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进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600人）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7·3”布告等工作。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9至10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11时开进清华校内。团派上上下下对于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工宣队，事先竟毫无所知（曾把数万人的工宣队讹传成10多万人），也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工宣队的开进意味着团派称霸清华的结束。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后来，由于南门等处先进来的工宣队开通西门，才使整个工宣队于中午时分开进清华校内。工宣队下属的8个团按照预先所定的计划，差不多同时到达各自的任务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进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以众多的人数（整个工宣队与两派武斗人员之比约为50比1）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住（实为扣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12时许，从北京站接人刚回来的蒯大富，在团派总部的所在地静斋的屋顶，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

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表示决不下武器，而后召集团派总部会议。会议决定：一、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14时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结果与市革委会负责人大吵一通，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他警告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一群众组织，1967年8月4日，被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队伍打垮。）来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扬言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来打，“我们就以死一拼”。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参加的会议上，谢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指示蒯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在清华，中午时分，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四派武器，馆内人员被全部带出。工宣队抵近礼堂时，团派人员引爆电发地雷。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礼堂。在礼堂里，工宣队搜查出团派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工宣队还在甲、乙、丙所搜出团派大批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工宣队在电厂与团派“守军”对峙，团派头目下令开启电网电闸，以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13时多，静斋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使许多工人掉进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15时许，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遭审讯或殴打。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处的工宣队；16时许，配合明斋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约天黑时，袭击丙所。这支队伍一天下来，使用长矛和手榴弹，连刺带炸，使100多名工人负伤。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7名工宣队员的腰或腿或臀部。

14时至15时许，团派60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刺伤、砸伤、炸伤数十名工人，把那里的工宣队赶至礼堂一带。16时左右，这支队伍在三院与其他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发起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130余人负伤，一军代表被炸伤，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约14时，工宣队完成了对10、11、12号楼的“包围”。15时许，工宣队开始进入10号楼，并与团派守楼者逐层对阵；16时许，守楼者两边夹击，俘虏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楼。17时许，10、11、12号楼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并破坏停放在那里的工宣队车辆，抢走工宣队的一些食品、物资等。约17时30分，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18时许，天下起雨来，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北京541厂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18时许，在撤至12号楼西北面场地的工宣队中，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17时至20时，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楼，加入追赶、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致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学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临时营地发动袭击，绑架工宣队队员，伏击工宣队要经过的道路等，使工人受伤人数增加。

21 时左右，团派几个头目（蒯大富不在）在静斋开会，决定深夜攻打 9003 大楼。他们以为工宣队指挥部设在该楼。更重要的是，该楼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基地之一，楼内仅手榴弹就存有数百颗。约 13 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 30 多名“守军”不得不逐楼逐层拼斗，打伤 10 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待深夜团派的 60 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小憩的韩现忠（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约 23 时 20 分，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两支队伍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 9003 大楼，而楼外实际上有数千名工人待命。直至 7 月 29 日，团派在该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中午，该楼团派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该楼的团派一直到 7 月 30 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 “井冈山”撤出清华

约 20 时，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教室，与工宣队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情，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约于 22 时 45 分签字后，蒯与 5 名工人代表、1 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

到达明斋后，蒯把代表们搁置一旁，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 30 多人参加的会议。

蒯大富先讲了形势的严峻，又讲了与工人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讲到这里，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接着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郊山区打游击，但会议还是决定 7 月 28 日凌晨 2 时 30 分前，团派全部人马撤至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图给工宣队一个难以呆下去的“空校”。

7 月 28 日 4 时左右，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境内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 200 号，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 2 人，炸伤 5 人。

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 27 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

件”，不愿意同时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意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队员“陪行”，于13时40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主要是命令四派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等），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等为借口，迟迟于16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份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当看到工宣队冒险把被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9003大楼的团派据点。“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

1968年7月27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向工宣队挾伐的血战之日。在这一天的12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里，工宣队有5人牺牲；有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轻伤者582人（工人552人，军代表3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工宣队扣留了100余名团派人员。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局势、团派撤离清华、四派认可工宣队而暂告结束。

◇ 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残局，特别是7月27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所遭受的惨重伤亡发生后的短短数小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亲自解决由百日大武斗所带来的问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内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7·3布告，挑动11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一电报显然带有夸张色彩。蒯大富此时认为工宣队背后有“黑手”指使，此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直言不讳地说，他本人就是这个“黑手”。

蒯大富发完电报，从市内刚回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市革委会来电话通知他参加中央领导人的召见。蒯大富接到通知后怀疑此事，担心遭“黑手”暗算，后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前去人民大会堂。

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对“五大领袖”

一一进行搜查。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已7时许。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谢富治把浑身泥水（北京当时有小雨）的蒯大富带进会场。蒯大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地大哭起来。这时先前到达的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汇报完毕。参加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中表现出对清华团派及蒯大富的复杂感情。毛泽东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团派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的名字和情况，他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毛泽东问蒯大富：“你们井冈山的人现在怎么样？”蒯大富答道：“一部份在北航，一部份跑到城里散了。”毛泽东对韩爱晶说：“你们不是亲密战友吗？要好好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向蒯大富问起团派小报《井冈山》为什么近来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这是因为近来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等等。毛泽东两次言不由衷地说道：“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毛泽东又明确地告知在场的人们，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容怀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就“七·二七事件”对蒯大富及团派立刻加以“问罪”或“惩治”。

同时，毛泽东也并不看好四派，他认为四派在清华上台不行。对于清华文革动态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进行了评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然而，毛泽东却下令释放有关方面关押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纓。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们及其各自相关的群众组织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

召见之后，谢富治留下“五大领袖”，让他们整理并署名《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作为此次召见的文件。以“五大领袖”署名的这份“批示精神要点”后来正式公布、传达，成为文革史上当然也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因为，7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缘于清华百日大武斗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是毛泽东对他与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林彪，给这次召见以及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以画龙点睛之笔：“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败。文革即将不可避免地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 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

# 【专题研究】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1966年6月，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接管了清华“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权。工作组进校后，清华大学各级干部被挂职审查。即使在工作组撤走之后，清华校内出现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也未能解决干部问题。在短短的4个月里，广大干部及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同年12月19日，清华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在当时一统清华“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不久，兵团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对包括干部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分歧日益加剧。1967年3月《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关于清华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调查报告（见本期通讯——编注）及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契机，清华4月14日出现了辩论干部问题的串联会，亦称“四一四革命串联会”。5月底，“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四派”）成立，形成了与兵团总部（团派）对立的局面。直到次年发生了闻名全国的清华七二七事件，两派不仅进行了铁与血的武斗，而且经历了颇具“文革”群众问题代表性的论战。

当时，两派的分歧和冲突，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明显的政治背景，也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思想影响。如《四一四思潮必胜》所言：“清华大学四一四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注：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1967年8月26日专刊）的确，全国性的“四派”诸如河南“河造总”、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及四川“产业军”、长沙“高司”、哈尔滨“山上派”，甚至还有武汉“百万雄师”等等，全国性的“团派”诸如河南“二七公社”、成都“八二六”、重庆“反到底”、长沙“湘江风雷”、哈尔滨“炮轰派”、武汉“工造总”等等，都可在清华两派的论战中或多或少地发现相应的影子或痕迹。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清华两派的论战也是“文革”群众运动中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分裂直至双方由武斗走向消解的历史命运的非常典型、鲜明和很有意义的案例。

一

清华两派不可能提出各自独有的理论，而是根据流行的正统“文革”理论加以应用和发挥，通过大字报等形式的论战提出或形成了各自的思潮。所谓思潮，即介乎系统理论与日常认识之间的流行于一定时期的观点或见解。任何群众运动都具有贯穿、调整及重新组合该运动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的某种思潮。清华两派的论战正是在彼此的思潮交锋中体现出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点：

### 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

“四派”认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部份改善和加强这一专政，因此，那些要彻底改善这一专政而否定或打倒一切的言行都是十分错误的。“四派”的观点主要体现在1967年8月出版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注：《井冈山》1967年8月26日专刊）。该文针对“团派”所代表的观点，强调“文革”与其他革命的区别在于它是共产党执政下的大革命，成为其对象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在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此，“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无论“文革”中阶级关系有何变化，“也决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文革”中，阶级关系是基本不变的。基于阶级阵线的不变，“四派”把“文革”的主要对象看作两个：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

这篇文章还着重指出，“文革”中的极左思想由否认“文革”与其他革命的区别而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把人民内部少数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作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大翻个的过程，断言在“文革”后财产和权力必须再分配，进而从“左”的方面复辟资本主义。正是由此问题，“四派”与“团派”分道扬镳。这个问题也是“文革”中全国绝大部份地区的造反派分裂并形成所谓两支造反派队伍的分歧焦点，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尽管两派在解决同走资派的矛盾时是统一的并在斗争中结为战友，“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路线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致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这就造成了两派对“文革”的任务、策略、目的等问题上的对立。“文革”在解决了走资派问题之后，两派及其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提到日程上来，两派的分歧和斗争使“文革”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走资派问题被群众派别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超越，“文革”由最初的清洗走资派转向群众派别的内战。

“四派”指出，“团派”在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夺军权时错误地认为，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已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已演变为“武化大革命”。殊不知军权牢牢掌握在毛主席手里，绝不能像以往冲击省市市委而夺权那样去冲击军区而夺军权。“文革”的进程绝不是像“团派”所想像的那样，“全国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与“四派”的理解截然相反，“团派”强调，“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讲即从本质上来讲是相同的”（注：《井冈山》1967年8月26日专刊）。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团派著文认为：“文革”与1949年前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的实质问题上”是相同的。“四派”提出“文革”和民主革命的“根本不同论”，“就是否认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权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就是否认对走资派篡夺了的部份国家机器（也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实行彻底打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句话，‘根本不同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论’！”（注：《井冈山》1967年8月26日专刊）

“团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最主要的敌人，混杂在我们的队伍中”（注：红代会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原四一四干部办公室编《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15页，1967年10月）。“四派”看不到这一点，否定作为“文革”理论基础之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提出关于十七年以及“文革”之际“阶级关系不变论”作为自己的根本主张，力图把同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与同走资派的阶级斗争相提并论。因此，“团派”和“四派”的斗争，“归根到底，也就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的问题，总之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并且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注：《井冈山》第151期，1968年7月5日）。“四派”的“阶级关系不变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按照这种“不变论”的逻辑，“中国就根本没有走资派，就根本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就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篡夺政权的烂掉了的单位，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注：《井冈山》第151期，1968年7月5日）

实际上，两派关于如何理解“文革”的论战不但源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而且一开始就来自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主张与部署的矛盾及缺陷。（注：例如，毛泽东1967年1月通过上海一月夺权发出全国性夺权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经过毛泽东审批的总结夺权经验的《红旗》杂

志1967年第3期社论中称：“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在同年2月12日召见张春桥、姚文元时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份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了包括一些原有干部在内的组成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原则。然而，到1968年4月，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显然，四一四思潮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相抵触的。从清华两派看全国“文革”，造反派与保守派理解“文革”的主要分歧是各自所持的“阶级关系大变动论”与“阶级关系不变动论”的对立。两派都囿于阶级斗争及阶级关系的理论套式，这不仅表明两派的局限，而且从同一理论套式和“文革”理论中推演出了截然相反的理解，正显示出进行“文革”所依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 二、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

“团派”声称，清华大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据点之一。清华十七年来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烂掉的单位，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注：《井冈山》第77期，1967年8月24日、8月26日专刊）。因此，对于旧清华十七年不仅要在组织上“大翻个儿”，而且要在头脑中彻底砸烂（注：《井冈山》1967年12月21日增刊）。要坚决反对旧清华“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坚决反对旧清华“上黑下红论”。

“四派”指出，清华“文革”前十七年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是，“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清华”（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11页。）。因此，不能对清华的十七年一概否定。应坚决反对旧清华“黑线上下连续论”。谁要把十七年说得一团漆黑，谁就是否定十七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往我们党的脸上抹黑。“四派”还强调，“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是占统治地位的，近几年来也是这样。”（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2页）不仅如此，即使“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注：上海市上海中学编：《历史的判决》，载《思潮集》，1968年）。

如何评价“十七年”的问题几乎是两派在一切关于“文革”问题上对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评价“十七年”，实质上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两派群众所采取的立场、策略、行为和评价，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十七年中这样那样的经历和直接间接的利益。从清华到全国，造反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大造“十七年”的“反”，而保守派却反其道而行之。然而，不但保守派是由“十七年”塑造的，即使是造反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十七年”所塑造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种因对“十七年”评价各异而产生两派分裂的巨大历史创伤时，更应该对“十七年”作出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 三、如何对待干部队伍

“团派”认为，说清华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不能回避他们过去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因为他们在“文革”前的表现不足取，他们绝不是左派，绝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清华干部大都是中间派，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充当了教育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清华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是复辟旧清华的社会基础”（注：《

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5页）。

“团派”根据毛泽东以及林彪的有关讲话，把“文革”当作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不仅“文革的群众批干运动天然合理”，而且批判干部才是“文革”的真谛，“否定批干运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今后的文化大革命，大约都会伴随一场群众批干运动”（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18页）。所以，清华大多数干部都应降职使用或当老百姓，更不能让走资派混入三结合机构，否则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是可能的（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14页）。“如果不正确对待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看不到解决清华干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就有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的危险。”（注：《井冈山》第36期，1967年4月18日）

“四派”则指出：“对干部问题上的分歧，追其根源，最根本的是对十七年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认识不同。”（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2页）毛主席关于团结95%的干部的指示依然适用于清华。清华广大干部无论在以往斗争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是在本职工作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二），第18页）。他们是革命的好干部，他们有错误和缺点，应允许他们改正，允许他们投入革命，不能把他们作为打击对象，对他们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只有保住他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胜利”（注：《井冈山》1967年7月5日新3号）。

“四派”认为：能否解放和大胆使用干部，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大批革命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红卫兵小将夺的权就有可能丧失，因为小将自身有许多缺陷。大胆使用干部就必须使革命小将让权、放权。没有一大片干部的彻底解放，没有一大批革命干部作为权力机构的领导和中坚，而由“团派”来独揽大权，肯定是行不通的（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9页）。随之，“四派”提出的“造反派只能夺权而不能掌权”，即“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在全国不少地方及群众派别中流行开来。

“文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两派都无法绕过干部问题。这一问题由于两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不仅变得日益严重和突出，而且带有全局性的影响。“文革”初期，几乎每一单位、部门和地区，干部问题都成为关系到谁来掌握运动的主导权的问题。若问什么是“文革”两派认识的主要分歧？回答应当是干部问题。

## 二

界定对立的群众组织及划分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颇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实际上，群众组织中，既有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也有两派各自内部的分化，例如，十分明显的就是造反派内的激进者与温和者之分，更有两派的交叉、渗透甚至部份重合。所以，纯粹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因为，常常出现的是，两派对“文革”的一些理论、策略和行动等有所认同，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各自的根本利益时，会泾渭分明地列出自己的阵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造反派”与“保守派”是可以划分的。

清华大学两派的对立表明：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造反派是“文革”的骨干力量。它的产生既得益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意图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质和要求。在此意义上，若是没有造反派，“文革”很难成为全国规模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群众性运动，很难成为触及到社会制度及国家政权的“大

革命”（或曰“大造反”）。因而，“造反派”大体上可指拒斥过去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领导体制，否定已有的干部权威和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群众派别。但是，造反派在行动上的异常激进最终导致它自身走向消亡的归宿。在一定程度上说，造反派的兴起与消亡是“文革”的一个缩影。

以“四派”为代表的保守派是“文革”当时的所谓“修正主义”力量。无论从全局还是某一局部，保守派都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文革”理论，都不可能进入“文革”实践的主流。尽管说“四派”具有“代表了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体系”有点言过其实，但它所掀起的“四一四思潮”的确成为“文革”中“河归旧道十七年”（注：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8月号第36期。）的主流。相比于诸多类型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成为“文革”中非常少有而又影响到全国的所谓右派思潮。这一派从种种方面对“文革”的疑虑、困惑、批评和失望，不断从思想上销蚀着“文革”理论，从实践上动摇“文革”的正统权威，最终在其著名的四一四思潮中否定了“团派”主张的“文革”。

那么，“文革”作为所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运动为什么必然会出现群众的对立和冲突呢？亦即群众问题的根本方面是什么？对此虽有不同解说，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从“文革”前和“文革”时的群众利益来把握，具体地讲，可从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来把握。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文革”两派的结构大致上显示出：造反派主要是由出身相对低下、“文革”前或“文革”最初本人遭受挫折或家人经历坎坷以及竭力在“文革”中改变自己地位的激进群众所组成；而保守派主要是由受原有干部影响和作用的，或在“文革”前本人经历较顺或家人处境较佳的群众所组成。两派的结构如此不同，他们就必然对“文革”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行动。所以，“文革”两派的利益既涉及“文革”前的利益格局，也涉及“文革”中的利益转换；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利益，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利益；既有不同阶层群众交织在一起的不同利益，也有相同阶层群众分化开来的相同利益。当然，这种种利益在群众中表现得非常广泛、复杂、曲折甚至隐晦，但其表现途径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与非群众性的上层利益有关；二是与“文革”前作为群众顶头上司的干部利益有关；三是与“文革”中因运动的开展暂时无职无权的干部利益有关；四是与对立的群众利益有关。

“文革”两派的利益渊源还表明：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都不可能摆脱“文革”理论的羁绊，但是两派都能从这一理论自身的破绽或弊端中找到各自的依据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参加运动。“文革”理论主要由三个内容及相应的衍生方面所构成：一是“阶级斗争论”及“继续革命论”；二是“群众运动论”及“全面专政论”；三是领袖个人崇拜及领袖极权权威。不过，这三个内容及衍生方面从未形成完全契合的有机体系，而是更多地散见于党的文件、报刊社论、首长讲话甚至鼓动口号之中，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文革”一系列的指示中。两派都从“文革”理论的巨大矛盾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并进而从事旨在打击对方的“武器的批判”。“文革”两派之间既无真正的胜利者，也无彻底的失败者，两派彼此消解，同归于尽，因为两派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心的“文革”领导者利用、制衡，甚至制裁。尽管如此，两派对“文革”理论的不同解释，更重要的是不同应用，充份显示出“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特有的认识背景、理论底蕴和思潮氛围。

“文革”两派的对立还告诉人们，群众组织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在它们存在的相当短的时间里，组织内的相对有序性和组织外的绝对无序性之间的矛盾。“有序性”往往表现为造反派处在一种夺权后自身变为“准政权”的状态，而保守派处在一种与造反派问鼎大权的“影子政权”的状态，亦即两派都具有在结构上力求健全、功能上不断强化甚至使整个组织准军事化的特点。“无序性”则使这些组织无一例外地既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地位 and 角色不能自主，又对自己的命运



乃至整个“文革”的命运无能为力。同时，“文革”群众组织必然带有暴力的特性，“武斗”就是其集中的表现。这种暴力性证明了这些群众组织远不像国外某些“文革”研究者所说的是什么民主组织，而是某种集体的或大众的具有专制性因素和特征的组织。另外，这些群众组织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意义上的群众组织。

“文革”两派的斗争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和如何对待本单位、部门或地区原有的中、基层干部。“文革”的悖论之一在于部份地否认“文革”前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至少是断定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着资产阶级专政，“文革”由此才显得必要。否定十七年还是肯定十七年，这是清华两派关系的一个死结，更是全国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纠纷的一个顽症。“否定十七年”一直贯穿于整个清华“文革”的过程之中。这就使清华“文革”初期带有如下的特色：“否定十七年”必然否定十七年中任职或成长起来的各级干部。因此，“文革”又可以说是“文革”崛起的造反派与“文革”前的干部队伍的一场较量。

“文革”初期，群众派别、干部势力和军队的介入，常常构成某一地区或单位格局的鼎立之势。随着形势的发展，不管是上至毛泽东本人还是下至各个地方或单位临时权力机构，都没有彻底地解决广大中、基层干部的“归属”问题，这些干部一时处在所谓走资派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夹缝”地带。他们无法主导现实，无法退回到过去，只能要求“解放”、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渴望置身于“文革”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同把“文革”当作一种批干运动的造反派相冲突，利用各种机会和施展各种才能与之进行难以调和的斗争，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就清华而言，干部问题成为“文革”初期不可逾越、不可化解的难题；就全国而言，干部问题使得“文革”群众问题格外复杂和沉重。所以，“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问题不可能是纯群众性的。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不到两个月时致信江青，他写道：“文革”作为“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然而，“顷刻瓦解”只是由于来自党内上层的高压才使北大、清华等校的党政系统陷于瘫痪。例如，清华两派论战时，有人就责问：原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于1966年6月被罢免，究竟是由下层群众“揪”出来的，还是由上层领导“抛”出来的呢？显然，对于干部队伍的重大打击肇始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和策略，而广大群众不可能是使干部队伍陷于“顷刻瓦解”的发端者，他们只不过是尽其所能地甚至尽其所需地把上述意图和策略加以转换、扩大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所说的“瓦解”难以成立，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刚进行了10个月，以广大中、基层干部为中坚的群众组织——“四派”的成立和运行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没有“瓦解”。这些干部经过“文革”初步的“洗礼”后“死而复生”，他们所发挥的政治功能及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致使“文革”战车在清华园里不可能完全循着毛泽东及“文革”的推波助澜者所指定的轨道行驶下去，不得不屡遭缓滞。

目前，在国外研究“文革”的学者中流行“两个文革说”。仅从学理上讲，这种把“文革”划分成“领袖文革”与“群众文革”的说法有可能大大激活对“文革”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可能把关注“文革”更大地投向人民群众之中，因而“两个文革说”仿佛成为1996年“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之际国际上“文革”研究的热点。但是，我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存在一个脱离毛泽东、形成全国规模的和群众独立、自主、自觉、自为的所谓“群众文革”。在“文革”这场历史剧中，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编剧兼导演”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演员”或“观众”中间不可能是彼此平等或并列的关系，不可能是互相独立或

互相反对的关系，更不可能是舍弃了该剧的时空条件而只有后来的评论者们所界定的关系。

在清华“文革”中，所谓“群众文革”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从来就没有什么范式，从来就不是由群众主宰的，而是矛盾多样并带有深厚的宿命色彩。的确，包括清华在内的群众斗争使“文革”之始相对短暂的斗黑帮、揪走资派很快被毛泽东等人未曾预料到的持久的群众对立和巨大的群众冲突所代替，对此，能说存在着一个所谓“领袖文革”面对着无数个相互矛盾甚至敌对的所谓“群众文革”吗？也正是由于毛泽东一声令下，在不到20个小时里，数万名工宣队员开进清华园，一下子扭转了清华“文革”进程，给全国“文革”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而那些把所谓“群众文革”加以夸大甚至绝对化的论者对此该当何论呢？“两个文革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我们应该不断地研究并解答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全部问题中，群众问题是最深重、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问题。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文献资料】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

〔编者说明：本文主要作者是王力、关锋，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报送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对此文批语：“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看一看。”文章的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是毛泽东改拟的，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标题。〕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份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

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鹏飞、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鹏飞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

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涛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学系党支委以上、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 (1) 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 (2) 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 (3) 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 (4) 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 (5) 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 (6) 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都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南翔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光美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六名学生组成）讲：“蒋南翔性质还未定”。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朝的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

）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林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

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

“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
“先扫外围，后打黑线”；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顺藤摸瓜，内查外调”。

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

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

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

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

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七月十日，王××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工作组撤走以后，在工作组一手扶持起来的清华“三临”（文革临时筹委会、“红卫兵”临时总部、临时主席团，都是由贺鹏飞、刘涛主持的）掌权期间，继续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氩氩氩氩氩惰性十足
一群混蛋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2)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份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

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一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3)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书记，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